郑州日报

2011年4月21日 星期四

精品文摘 第230期

编辑 李昆霞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3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异想天开

李冬晖

1952年，华盛顿发生了史上罕见的雪灾，一千多公里电话线因暴风雪形成“冰挂”，有些地方的电话线被积雪压断，造成通讯中断。为尽快恢复通信，电讯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希望通过集体的智慧找出对策。

讨论开始了，有人提议沿通信线路安装加温装置以融雪，但要耗费大量的电力、人力和时间；有人提议安装振荡器，通过振动抖掉积雪，但这同样费时费力。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了很多办法，却都不尽如人意。这时，一个声音从角落里响起：“还不如用最简便的方法呢，拿把大扫帚沿线清扫吧！”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哄笑，连发言者自己都乐不可支地承认是“开玩笑”。

“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把扫帚换成直升机。”另一个人突然灵光一闪，被这句笑话点醒了。于是，一个想法渐渐形成：出动直升机，沿积雪严重的电线飞行，让螺旋桨高速旋转时产生的垂直气流将电线上的积雪吹落。果然，公司雇用的直升机很快就有效、低成本地完成了任务。

水击生涟漪，石击生火花，思想碰撞生创意。当“头脑风暴”时，任何“玩笑”都应该被鼓励，因为从“异想”到“天开”，往往只有几步之遥。

摘自《光明日报》

大学的责任

杨玉良

16字治学理念

我回到复旦履职已经整整两年了。我是大学校长，不是官，我希望我的话永远是坦诚的。如果说，我对于治校有什么想法，可以用“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这16个字来概括，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这些理念如果长久不谈论的话，也不行。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看起来很幼稚，这个幼稚叫什么呢？叫纯真。最近我跟复旦学生在对话的时候，我就说要依靠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纯真，再加上复旦大学的光荣传统，来推动改革。

一所大学没有学术，这所大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一所大学的各项事务必须以学术作为灵魂。但在大学里，“学术为魂”要真正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学术的优先地位，在各个环节都贯彻学术的中心位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要求要以学术为核心环节，以追求真理为使命。复旦培养的学生应该不畏权贵，精神高昂，抬着高昂的头，只会向真理屈服，其他的都不会屈服。“育人为本”，这是对大学办学基本目的的回归，大学不育人的话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不过讲到“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高深”。很有意思的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国家的法制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完善，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在依法整治，非常严格地按照法律在执行，例如企业管理，但在大学里面恰恰不是。民主决策也是的，包括复旦也不够民主，即所谓用行政权力去挤占或者说替代了学术权力，有不少的现象存在。

有时候我觉得当领导的可以是最笨的，但是不要紧，你只要掌握一个办法，即能把智者们的思想汇拢起来，就可以使决策少犯错误，这就是“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最基本的方法。最近我们复旦做了一些改革，可能大家会感兴趣，基本上遵循了16字治校理念。最近我开了一个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这是我本人最后一次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提出来，所有的领导干部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这样就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隔离。

为了使他们的工作不是空架子，我们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校学术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些意见将是学校领导执行学术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就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有人就问我，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决议跟学校领导的意思不符合怎么办？我说校长无权否决学术委员会的决议，但可以要求复议，做出一个更合理的决议，然后再由学校的决策部门转到职能部门执行。

“自讨苦吃”

有时候我们喜欢用“改革”这个词语，但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改的，什么事情都需要去大改的，更多的事情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去坚守或者是回归的。

2010年，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大事是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复旦大学一共有三个项目被列入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名单，分别是通识教育、拔尖学生培养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主动请缨有点“自讨苦吃”，但这体现了我们的追求和责任。温总理在很多场合都说希望大家大胆试点，我胆子是比较大的，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很难把握，有时候太大了是胆大包天怎么办？有时候太小又会止步不前，这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设计中，比如通识教育改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中要全面推进书院建设。复旦学院将会组建若干个书院。书院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天地。每个书院都会聘请院长，学生规模相当，还要配置住宿、管理和公共活动的设施设备。让书院不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还要赋予它更多的教育功能，让大量的导师住在书院。哈佛大学原来的哈佛学院就是他们的本科生院，他们的老院长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把课外的教育和宿舍完全交给行政人员的话，那是不可能让学生得到好教育的”。

大学做事，想清楚的时候就坚决干。如果还没想清楚，并且这件事情暂时还不着急，就不要急着干。如果事情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又很着急，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干，边干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教育是百年大计，有些事情没有想明白就做了，做了以后，要改回来，精力、金钱、资源都要花费好几倍才能改过来，甚至常常是改不回来的，这个损失就大了，一损失就是一代人，所以要非常谨慎。

为了推进改革，我们也在争取向教育部申请一些权力，例如自主招生、自主与海外合作办学、自主进行学位管理和专业审批，等等。实际上，大学的自治权世界各国大学都在积极争取，他们只是比我们好一点。我去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听到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都在说要争取大学自治权，所以不要抱怨，我们都是在争取。我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自主和海外合作，自主招生，自主进行学位的管理和专业的审批，等等。

问题是怎么改革，以及怎样一步步落实这些愿景。 （转右面）

（接左面）

追求决策不犯错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是大学内部治理的两个基本原则。复旦大学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大学内部治理，概括地说，其实涉及的就是一个在学校内部如何“分权”的问题，在分权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治理的结构。

以耶鲁大学为例。在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是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正如《时代》周刊所评论的，人们可以说耶鲁的进步不快，但是，“其进步总是有选择的和基本上正确的”。大家可以去看耶鲁、哈佛、牛津、剑桥以及加州理工，他们都不是赶时髦的大学，但却一直是努力避免决策失误的国际一流大学。

校长们都很关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认为这就需要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根据宏观情况来分一个百分比，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具体工作，由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校领导担任召集人，但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进入委员会的各个学科的专家。

复旦新近有一个例子。2010年10月的教代会上，我们通过了复旦自己的《教职工违纪处分条例》。制定这个条例，不少教师当然很气愤，说为什么不制定一个奖励条例，而制定一个处罚条例？有一个律师跟我说，假如学校处罚了一个教师，因为这个条例是党政会议或者党委常委会通过的，然后我们来处罚，但是处罚后有一些教师不服处罚，他到法庭去告复旦大学，说学校的处罚不对，法院就要来取证，如果你依据的是党政联席会议或者是党委常委会通过的处罚条例就没有法律效力，你的官司肯定会输。因此，我们在立法前，专门咨询专家，凡是与教职工奖惩有关的规章、决议，都必须经由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个《条例》明确了校内每一位教师的职业纪律准则。将来如果有教师发生违纪情况，例如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就有了处分的法律依据。

这个案例就属于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的范畴。目前学校的管理是有不少的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就是解决学校的“民主”和“法治”。

人文振兴

这一次，复旦加大了对医科和人文社科的投入，尤其是人文社科。除了加大投入，还启动了“人文振兴计划”。一是大学文化自觉的需要，二是主动参与国际对话的需要。中国不是说要输出价值观，我们只是不想被人误解。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被误解得太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挨打问题”，我们不挨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解决了“挨饿问题”，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再挨饿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挨骂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文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想跟国际上著名的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组建一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挨骂问题”。

我的女儿在德国念博士的时候，有一位法国人在看中国的《道德经》，是英文版的，这个法国人第一句就看不懂，“道可道，非常道”，然后就问我女儿是什么意思。我女儿拿过来一看，傻了，英文是这么翻译的，“道”翻译成真理，这下就麻烦了，可以想象一个法国青年为什么看不懂，“当中国人在说真理的时候，那个真理肯定不是真理了”，这个误解太大了。中国的“道”不完全是真理，还有自然规律和某种精神的东西，他翻译成为真理以后，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产业和战略，而大学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大学也是的，是中国魂，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神圣的殿堂。

还有一个考虑是纠正工具理性泛滥的需要。理性是有区分的，可以分成：道德理性，最基本的本质是正义感，这个理性是用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善和恶，或者是丑和美的，这个理性完全是属于价值领域。科学理性，其本质是求真，它的功能是用来判别真与伪的，包括逻辑、推演、分析、归纳、综合等手段，它属于科学领域的规律探索。还有就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是功利，它是基于对手段和目标之间最佳途径的机巧理解，它的基本点在于机巧和计谋，不是技巧而是机巧。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善和恶而去寻找的一种最佳的途径。

如果只有工具理性而没有前面两个理性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是不是要利用手段，比如人脉或者其他所有的工具，调动这些东西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工具理性泛滥，那就会导致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学生如果受工具理性影响，就会降低个人的道德情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生的问题，最根本的来源就是我们忘掉了前面的两个理性而只剩下第三个理性，这在教育上来讲就是失误。我们希望教育能够改变这个状况。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学是主角，责无旁贷。

摘自《南风窗》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名流故事

我心如竹

贝聿铭

在长达70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我先后设计规划了法国罗浮宫博物馆，美国国家艺术馆东楼、肯尼迪图书馆等建筑，大部分作品都与文化艺术有关，符合了自己的追求。

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罗浮宫重建，并为罗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罗浮宫”，不分昼夜表达不满。

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罗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被总统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但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

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但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筑不是服装，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从来不赶时髦，我比较保守；但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

我曾受邀在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很像日本一种传统乐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日本人很喜欢，后来再次邀请我为博物馆做设计。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很羡慕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对，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日本人非常接受这个设计。

在我的70多件作品当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

86岁那年，我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选在苏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苏州三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边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一出台，又引起了各界强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损害这些古建筑的真实与完整。但这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

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而且是一个建筑师在年近90岁时的一份认真、执著和创新，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摘自《广州日报》

陈寅恪的“怪题”

谭汝为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约请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就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陈先生解释：“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借以考核考生的史才（剪裁和组织材料的能力）、诗笔（艺术技巧的修养）和议论（对事理的识见）。

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结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这次考试，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数学家，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王引之是清代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江苏高邮人，继承其父王念孙的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学术贡献很大。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撰文回应：“‘对对子’最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对对子’也可测验学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还可测验其思想条理。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上联‘孙行者’，下联标准答案为‘胡适之’。此联乃化用苏轼《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另外，盖胡（猢）孙（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陈寅恪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可见陈公名望颇能服众。

陈寅恪先生对语文教学和考试命题的观点，在于突出中国语文教学的特性，对今天的语文教研不无教益。

摘自《思维与智慧》

陈坤：不快乐是生命中的盐

叶倾城

有时候，陈坤会想：没有那些童年的不快乐，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有些事，只是不愿提起，却无法忘记。小时候，他一直在外祖母家长大，11岁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的家里，还有继父以及异父的弟弟。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陈坤小时候经常吃不到肉，他对自己说：这不算苦。他从来不曾膝下承欢过，已经在努力当一个负责的大哥：把肉让给弟弟吃，心疼弟弟，告诉弟弟要听话。

记得有一次，母亲无意中提到：过几天是自己的生日。陈坤省了好几天的早点钱，终于能够在菜市场给母亲买一个面包，他在电影里见过人家在面包里夹肉或者香肠，但他没钱了呀。他在菜场徘徊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一个摊子，在卖熟透的西红柿，很便宜。他赶紧买了下来，夹在面包里，送给了母亲。

从那之后，母亲就一直爱吃这种夹了西红柿的面包。

在学校里，他是班里唯一一个父母离婚的学生，这常常让少年陈坤被另眼相待。同学们去郊游，都不肯带上陈坤；老师挑了些学生参加体育训练，跑步或者踢球，都没有陈坤的份。可是有一次，上补习课，一个新来的老师来班上通知：田径队的同学可以不用上课，直接去活动。老师不知道谁是田径队的，陈坤就举起了手说：我是。

那一刹那，他觉得特别荣耀，像被一个团体接纳了。

他真的去了，老师很奇怪：“你怎么来了？”接着让他跟着其他队员一起跑了一圈，但最后还是说：“你明天不要来了。”

陈坤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去河边游泳。舶船空载的时候，船舷离水面特别高，他最喜欢爬上去，以漂亮的吸腹动作，一个飞燕式直跃入水。水声泼溅，仿佛刹那间，他分身为二，一个是表演者，另一个是观看者，为自己轻轻地鼓掌喝彩。

他也常常地，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比如说，幻想母亲常常陪在自己身边，叮嘱自己加衣服，教导自己做功课。有时候，在他心目中，母亲与老师合二为一，既严厉又温柔，无论在哪里，都一直陪着自己。

从那时起，陈坤就发现了世界是分层次的，一层是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而另一层是一个华美的、无所不有的幻想世界。他在两个世界里自由驰骋，无往不利——也就是凭着这样的能力，他一步步，走进了电影的领域。

电影，无非就是梦中的梦，他甘愿做一个造梦的人，把自己所思所想所梦所惧，与所有人分享。人家耐不住寂寞，而他已经习惯；人家渴望喝彩，而他能听见自己内心鼓掌的声音。

他终于明白：童年的痛，就是为了此刻的成功在打底。他甚至感谢父母的离婚，让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也许，历经孤单才有表达欲，及其表演才华；也许，被拒绝的痛，让他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和人生。

如今，陈坤感谢那些不快乐。那是生命中的盐。

摘自《莫愁》

于瞬间决定我生命的方向

于丹

回望我羞涩沉默的少年时代，几乎所有光荣与梦想的记忆都和语文课相关。

我的偏科几乎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除了交上去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念之外，别的科目差不多一无所长。进入中学之前，我一直是个不大被鼓励的学生，直到初二的时候，一位特别欣赏我的老师让我做了语文课代表。

这位老师个子小小的，操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指间总是夹着一只红色有机玻璃的小烟嘴，进课堂前才扔烟头，然后指间换上粉笔，在黑板上留下一大片气象豪奢华美的板书。

语文老师姓王，是个才子，年轻时据说差点留在北大中文系，不巧赶上“文革”，北大就没有留校教师这一说了。于是他来到了现在这所学校。王老师说他有个梦想，就是亲手培养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我这样一个偏科的孩子就在这个时候被他任命为语文课代表。

我在那一年里几乎天天读古文，大量地背诵，并且一次次地在课堂上发言。王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在南锣鼓巷那个大杂院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中，我看见中药房药柜似的资料柜贴着斑驳的墙壁，那一柜子卡片，在小小抽屉里一张张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斜阳很温柔地照进来，逼仄的小屋一端是美丽的师母安详地缝被子，另一端是老师给我讲怎么做学术卡片……

高中，我考进北京四中。

王老师流着眼泪跟我说：“四中是所好学校，你去吧。”

我读了中文系以后，老师很高兴，那时候他更苍老了，还是那样神采飞扬地跟我聊古文，只不过常常被一阵阵剧烈的咳嗽打断。

我读大三的时候，我几乎决定报考文艺学的研究生，这时传来王老师住院的消息——肺癌晚期。我明白离别的时刻就这样临近了。我能说什么呢？我的语文老师，曾经用生命提携并且期待着我的语文老师……我哽咽着对他说出了一句话：“老师，我报考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老师的手突然一下子抓紧了我，从浓重的痰音间挤出了一个字：“好！”

一周后，我正式报名时，老师辞世。师母说，那个“好”字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的言语。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一生中总有几个人，像钉子一样守候在命运的岔路口，一瞬间就决定了生命的方向，于流光中迤逦引远的时候，他们的音容寂然，镌刻在了我心底不能惊动的地方。

摘自《文苑》